

双向赋权：国际移民影响母国的作用机制探究

李夏菲

[摘要] 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接收国偏见”，即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问题，而相对忽视国际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在移民数量持续增加的当今世界，移民对母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从跨国主义理论的角度，探究国际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移民的跨国实践创造出跨国社会空间，该空间的跨地域性使得移民呈现出“双重联系”的特点，客观上赋予移民影响母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和权力通过“双向赋权”的方式实现：一方面，移民在经历接收国的“再社会化”后，通过跨国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性汇款”对母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母国对移民的“英雄化”与“他者化”，客观上构建了移民对母国发挥影响的途径。

[关键词] 跨国主义；国际移民；双重联系；双向赋权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在传统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既有的理论和案例大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移民与其所生活的接收国的互动关系研究上。^① 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和同化，到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的处理，关于国际移民与接收国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分析和理解国际移民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传统的移民研究较多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问题，而相对忽视国际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存在所谓的“接收国偏见”（receiving country bias）。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对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垄断所导致的。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移民的重要流向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后者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西方国家基于其内政外交的需要，在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方面逐渐形成“接收国偏见”。

作者：李夏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lixiafei@ruc.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Z世代’青年亚文化背景下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路径研究”（23CH205）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① “移民”根据是否跨越主权国家边界而分为两类：国际移民，即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人口流动；国内移民，即在主权国家边界内部的人口流动。本文所研究的是国际移民范畴，在行文中出现的“移民”全部指代国际移民，并不指代国内移民。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关于移民的定义是，符合改变常住地（change in residence），以及跨越行政管辖边界（crossing an administrative border）这两个特点的人口流动即为“移民”，各国对于移民定义的不同仅存在于对“常住”的时长界定不同，有的国家认为居住3个月以上就可以称之为常住，而有的国家则需要12个月以上。本文研究的移民群体既包含具有母国公民权的海外公民，也包含已经失去母国公民权的非公民。

然而,移民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的“反馈机制”,即移民在接收国所接触和收集的各种情况和信息被传送回母国的过程,对于移民群体的决策、行为模式等方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①特别是在20世纪末,社会科学研究发生“跨国主义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后,许多学者开始从国家层面的研究转向更加强调人与社会的跨国界联系,试图更多维地、实证地理解全球范围内的复杂互动和依赖关系,这一点在移民研究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②跨国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主张“放弃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分析框架,强调跨国社会实践超越民族国家及其边界控制的特征,特别是跨国实践参与者既在此又在彼的生存状态和双重甚至多重身份意识”^③。由于跨国主义将“跨越国界”作为主要研究视角,使得移民研究成为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移民研究领域的跨国主义是指国际移民日益增长的保持与母国持续不断的联系的趋势,在这种跨国联系中,移民会产生不基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④

跨国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带来了传统移民研究的“反叛”。传统的移民研究经常基于一种前提假设:即移民把自己从母国连根拔起,通过艰辛的旅程到达目的地国,之后尽其所能融入当地。因此,传统的移民研究理论总是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与同化问题。但是,这样的假设很明显地忽略了影响移民进程的重要变量,即移民的母国,以及由移民的跨国属性而创造出的跨国社会领域。特别是随着跨国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一些国家对于国籍政策的放松,使得跨国主义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逐渐兴起的新领域,成为研究国际移民的跨国关系的重要视角。相应地,移民研究领域出现了“跨国主义转向”。^⑤

当代的移民群体和个人与其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并不影响他们在接收国的融入过程。^⑥所以,为了扭转移民研究领域的所谓“接收国偏见”,对国际移民与母国互动关系的研究成为跨国主义转向之后移民研究领域亟待关注的新兴视角。既然移民可以对母国施加影响,那么关于移民如何影响母国的讨论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解释国际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二、双重联系:国际移民的属性及其跨国交往空间

跨国主义转向后的移民研究强调不应仅以国界为限制研究移民在接收国或母国的行为,而应着眼于对移民创造出的“跨国社会领域”的研究。这个社会领域将他们的母国、接收国,以及其他跨国网络联系起来。该领域的一端联系着移民母国,另一端又联系着移民接收国,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团体成员界限的重叠空间”。^⑦这个跨国空间的概念不同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某个特定的地方,它包含或跨越了不同的领土疆界,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地方;这个空间具有超越简单地域的社会意义。^⑧在此空间之中,移民不与单一国家的国内政治进行绑定,而是通过与两个国家

① Akin L. Mabogunje. "Systems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0, 2 (1): 1-18.

② Thomas Faist.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Migra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 and Polity". In Maja Povrzanovic Frykman (eds.). *Transnational Space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Malmö University, 2004, pp. 11-45.

③ 潘志明:《跨国主义》,载《外国文学》,2020(3)。

④ David Bartram, et al. *Key Concepts in Migration*. Sage, 2014, p. 140.

⑤ Steven Vertovec.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 38 (3): 970-1001.

⑥ Peggy Levitt, and Nadya Jaworsk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 129-156.

⑦ Rainer Baubock.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3, 37 (3): 700-723.

⑧ 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6.

的“双重联系”获得赋权，从而完成对母国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的过程。^① 移民创造的“跨国社会领域”的概念与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不谋而合，即个体与他们的社会位置所存在的特定空间，每个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由这个空间里的规则、个体的惯习以及个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本的互动而决定的。在移民研究中，移民的跨国流动所创造出的跨国联系网络被学者们称为“跨国社会场域”或者“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用以描述国际移民跨越不同国家的家庭、经济、机构、与政治联系。^② 由于国际移民创造出的跨国空间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地域性”的游牧常态，跨国主义便对传统研究强调固定领土边界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了一种挑战，从而出现了“去边界化的民族国家”（de-territorialized nation state）的概念。^③ 在后殖民时代，对输出大量移民的母国来说，国家的地理边界不再被认为可以涵盖和限制所有国家公民和政治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与散居在外的公民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交流对维持母国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些国家会产生“去边界化”的倾向，并将海外移民依然看作自己国家的公民，比如格林纳达、圣文森特、海地和菲律宾等。^④ 这些“去边界”的海外公民可以为母国提供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包括提供稳定的投资、侨汇以及作为母国在国外的政治代表。母国政府并不需要他们返回母国，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接收国落地生根同时为母国提供支持。^⑤ 基于此，鲍博克（Bauböck）提出“跨国公民”（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的概念^⑥，并认为移民带来的政治上的跨国主义，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预设，即“封闭的社会”（closed societies）以及公民对单一国家的排他性忠诚（exclusive loyalties towards a single state）。^⑦

在此跨国空间之中，国际移民最显著的属性正是“双重联系”，也就是说，国际移民不再需要在母国和接收国之间选边站，而是在融入接收国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与母国的强烈联系。在这种“双重联系”的状态下，移民的自我认同不再是接收国内所谓的“带连字符”（hyphenated）的少数族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而是既是墨西哥人，又是美国人。这种“双重联系性”便导致了一种跨越边界的“既不完全在这里也不完全在那里”的不稳定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既在母国又在接收国”的双重参与的状态。于是，移民因其身处跨国社会空间的“双重联系性”而被赋予了在母国和接收国同时进行社会参与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移民对母国和接收国都具有发挥一定影响力的可能性。对于移民母国而言，移民之所以能够在不处于母国疆域和法律管辖范围之下而获得参与母国国内社会的权力，正是由这种“双重联系”的不稳定性而决定的。有学者对2020年美国两大党派围绕海外移民的“邮寄投票”展开的较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两党在话语、行政、立法、司法等领域对邮寄投票的不同反应，研究指出国际移民对母国的国内选举政治，特别是在赢得关键州选票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⑧ 国际移民会不断地比较接收国和母国之间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与各国

① 这种影响不仅仅针对母国，国际移民同样也可以利用自身所处的跨国场域对移入国施加影响，但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故此方面不加赘述以防混淆。

② Linda Basch, et al.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Routledge, 2005, p. 264.

③ 吴前进：《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欧美学者的观点和贡献》，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4）。

④ Linda Basch, et al.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Routledge, 2005, p. 293.

⑤ Alejandro Portes. “Conclusion: Towards a New World—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9, 22（2）: 463–477.

⑥ Rainer Bauböck.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3, 37（3）: 700–723.

⑦ Rainer Bauböck,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Membership and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dward Elgar, 1994, p. 132.

⑧ 张业亮：《邮寄投票为何成为美国两党争议的焦点》，载《世界知识》，2020（20）。

不同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由此可能会影响移民对母国的态度。^①这就使得国际移民在母国可能会成为新规范的倡导者。^②也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墨西哥人同乡会等移民社团组织可以积极影响墨西哥政治的民主发展进程。^③同样,一些海外印度人在接收国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成为各自定居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沟通印度与其所在国关系的‘无形的手’”^④。印度精英在移民后依然对印度保有的“长距离民族主义”,而印度精英阶层的移出而带来的纵向阶层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民主进程。^⑤

基于移民的“双重联系”特性对母国可能带来的影响,移民的母国出现了各种加强对本国海外移民的联系与管控的措施。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国际移民的“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成为母国为移民赋权的渠道之一。巴里·金(Barry Kim)将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经济公民权”(economic citizenship),即移民的经济公民权与政治公民权息息相关,由于国际移民对母国具有经济影响力,移民母国也相应地赋予其参与母国政治的权利。^⑥根据统计,1970年,只有9个国家将投票权扩大到海外公民,其中大多数属于全球南方国家。199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开始为海外公民提供缺席投票渠道。2000年,该趋势扩大到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大多数国家。2020年,共有141个国家为海外公民开放了缺席投票的渠道。^⑦提供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渠道的移民母国数量的大量增加,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海外移民对母国的影响力重视程度的提升,也体现出其对于加强与海外移民的联系和管控的愿景。当然,尽管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海外公民参与母国国内选举投票的权利,但是由于移民“双重联系”的特性,对于移民的缺席投票行为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在法理层面,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参与权应该只赋予那些在它的法律约束之下的人,国际移民不需要遵守母国的法律,所以他们不应该在母国继续享有选举权。^⑧在操作层面,缺席投票的方式存在三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即海外公民的政治代表问题、在外国领土上举行选举的司法审查问题,以及缺席投票的透明度问题。^⑨

除了世界范围内缺席投票规模的扩大现象之外,基于移民“双重联系”的特性,有的母国将其国际移民转化为“移民武器”(migration weapon),即利用大规模移民或难民为筹码,胁迫接收国接受或支持自己的诉求。凯利·格林希尔(Kelly Greenhill)提出,移民武器是一种由母国对接收国实行的胁迫性的外交策略。通过分析历史上出现的50余次类似案例,她发现在超过半数的情况下,移民母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诉求。而这种较高的成功率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保证的,一是通过让接收国的物质和政治承载能力被大量移民涌入而压垮来进行直接威胁,二是利用政治体系内一般存在的利益不一致,进行基于规范的政治勒索。^⑩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

① Yun-Han Chu, et al.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East Asia". In Yun-Han Chu, et al.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8.

②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 52 (4): 817-917.

③ 左晓园:《移民:可以借重与显效的力量——旅美墨西哥移民对墨西哥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3)。

④ 李丽、李涛:《海外移民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以印度为例》,载《南亚研究》,2009(1)。

⑤ Devesh Kapur. *Diaspor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2.

⑥ Barry Kim. "Home and Away: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in an Emigration Context". *NYU Law Review*. 2006, 81 (1): 11.

⑦ Elizabeth Wellman, et al. "The Extraterritorial Voting Rights and Restrictions Dataset (1950-2020)".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23, 56 (6): 897-929.

⑧ Ruth Rubio-Marí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emocratic Nation-state: Normative Challenges of Expatriate Voting and Nationality Retention of Emigrants". *NYU Law Review*. 2006, 81 (1): 117.

⑨ Dieter Grotz and Florian Nohlen. "External Voting: Legal Framework and Overview of Electoral Legislation". *Boletín Mexicano de Derecho Comparado*, 2000, 33 (99): 115-1146.

⑩ Kelly Greenhill. *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主义所强调的“跨越边界的联系”，即移民的“双重联系性”，正是移民得以对母国产生影响的基石。^①

三、双向赋权：国际移民影响母国的作用机制

国际移民的“双重联系”特性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很多影响，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国际移民从建立具有“双重联系”的跨国社会场域到最终对母国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基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实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国际移民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对母国产生影响：一方面，移民在接收国经历“再社会化”后，通过社会性汇款实现对母国施加影响的赋权过程；另一方面，移民母国对移民的“英雄化”与“他者化”，客观上构建了移民对母国施加影响的途径。也就是说，移民基于自身在跨国场域中所形成的与接收国和母国的“双重联系”，通过接收国和母国的“双向赋权”，具备了影响移民母国的国内社会的可能性。

（一）来自接收国的赋权——移民的“再社会化”与“社会性汇款”

移民在接收国的生活必然会面对来自接收国的社会影响，而移民将来自接收国的影响进行内化的过程，就是移民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完成“再社会化”的移民在与母国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便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母国社会输入来自接收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传递方式，被称为“社会性汇款”。本文认为，移民影响母国的第一种赋权方式是移民经历来自接收国的“再社会化”后对母国进行“社会性汇款”的过程。

上文提到，传统移民研究的视角将移民视为一次性的单向移动的过程，即移民从母国将自己连根拔起，漂洋过海到达接收国并义无反顾地融入当地的过程。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随着移民在接收国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在接收国的政治参与度会相应增加，而在母国的政治参与度将会相应降低。^②这使得移民的社会参与的增加看起来呈现出一种在母国和接收国之间进行零和博弈的状态，即移民必须在母国与接收国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参与的增加则必将导致在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参与的减少。但是，基于跨国主义理论，融入接收国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与母国的疏离，即移民并不会完全“融化”在接收国，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在母国生活的经历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移民在接收国的行为。所以，移民在与接收国互动的过程中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分段同化”过程，这种非线性的融入过程是“崎岖不平（bumpy）”的。^③

当然，在移民与接收国的互动过程中，接收国也可以对移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移民来说，在国外陌生环境的生活经历某种程度上对其身心进行了重塑，该塑造强度不亚于幼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当抵达一个新的国家后，移民为了适应接收国的社会环境，需要重新了解接收国与母国不同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扩大社交圈子、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学习如何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加入当地的社会团体开展社交活动。这些新信息的吸收和内化一方面源自移民基于自身经历的需求，如在接收国当地顺利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也源自接收国对移民的客观要求，如在一些国家设立的取得居留资

① 需要澄清的是，跨国主义并不力图创造一个与地域性的民族国家相对立的“非地域性”的或者“后国家”的空间，也不是将“国家层面”和“跨国层面”的政治参与对立起来。因为在跨国主义中，移民的政治活动仍然是以母国和接收国这两个地域性的国家为对象的。跨国主义并不只是移民对母国的单向的政治参与，而应将其进一步扩展到移民的跨国政治活动对母国和接收国的双重影响上。

② Ali Chaudhary. “Voting Here and There: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ngagement among Immigrants in Europe”. *Global Networks*, 2018, 18 (3): 437 - 460.

③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 (1): 74 - 96.

格和加入国籍的考试之中出现大量相关题目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从生活方式到文化和政治观念的转变,从而将这些新的观念和经历进行内化,同时与母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移民的“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即移民在融入接收国的过程中,受到自身的移民经历以及接收国的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而再次出现的社会化的过程。一般认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个体将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内化的过程,即“向缺乏阅历的个体传授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过程”。社会化相关的研究大多被用于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对儿童成长的相关解释。虽然社会化的过程会持续个体的一生,但一般认为,深远而持久的社会化过程主要发生在个体的童年时期。^①特别是如果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较为稳定,那么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完成得较早,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对于经历较大的生活轨迹变动的个体而言,社会化的过程并不是顺利而平稳的,甚至会经历对既有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重塑。这个过程涉及对已有社会化结果的修正甚至抛弃,以及对新的社会环境的再适应,也就是“再社会化”的过程。“再社会化”是个体在后天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下有意识地进行,如入伍、入狱,或重大的社会角色转变等,其中国际移民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导致个体“再社会化”出现的原因。国际移民经历的“再社会化”过程与一般认为的在个体年幼时期经历的社会化的过程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形成时间较晚,且是由于个体主动的移民实践而产生的,会对年幼时期被动形成的初次政治社会化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一定的影响。随着移民与接收国当地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日益靠近,“再社会化”的作用也就越显著,特别是第一次移民的经历越年轻,这种“再社会化”的可能性就越高。随着移民在接收国融入程度的加深,“再社会化”的过程将会随之不断深化。^②通过“再社会化”过程,移民的知识和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与其原来在母国的经历的差异,在对比的过程中,他们便产生了对母国社会进行参与和影响的意愿。如希梅内斯(Luis Jiménez)提到:“国际移民在外的经历,会导致他们在母国和接收国的两套不同的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有意无意的比较,这注定会影响他们回国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③

由于移民的“双重联系性”,移民在接收国进行“再社会化”后所习得的新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并不仅仅停留在其与接收国进行互动的时候,而是会外溢到移民与母国的互动过程中,从而对母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移民的“社会性汇款”得以实现的,即移民对母国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包括观念、行为、身份和社会资本从接收国向母国的回流。^④在许多情况下,移民出国并非移民的个人选择,而是为了一个家族甚至整个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时,移民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外出寻求工作机会来减轻留在母国的家庭成员的生存压力和不安全感,以改善整个家族甚至族群的生活条件。这种移民与母国的联系更加持久、互动更加频繁,因而这些移民可以通过频繁互动对依然生活在母国的家庭成员和社区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很多国际移民的移民行为并不是长期和永久的,一些移民在达到目的(如工作项目结束、积累足够的资产等)之后便会回到母国,那么在接收国经历的“再社会化”过程对其回归母国之后的社会参与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移民对母国进行“社会性汇款”的基础,移民与母国之间持续

① Joan Grusec, and Paul Hastings.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4, pp. 3-4.

② Peter Dinesen, and Rasmus Andersen. "The (Re) Socialization of Participatory Political Culture: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their Contemporary Country and their Ancestral Country". *Political Geography*, Paper No. 102650, 2022.

③ Luis Jiménez. "De Paisano a Paisano: Mexican Migrants and the Transference of Political Attitudes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8.

④ Peggy Levitt. "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8, 32. (4): 926-948.

存在的紧密联系，即移民的跨国主义倾向，为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提供了较为畅通的渠道。

具体而言，移民进行“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着其在母国的亲人及社群的方方面面。移民可以通过与在母国生活的亲属和朋友的个人交流、资金汇入、投资产业、兴建学校、参与侨团等各种行为，无意或有意地对母国进行“社会性汇款”。这些“社会性汇款”的影响也是多样的，诸如将移民行为视作摆脱贫困的最优出路并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移民在接收国学到相对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后协助母国进行经济发展、^①以及由于移民的跨国特点而导致的侨乡传统家族亲属关系以及夫妻亲密关系的变革等。^②这些汇入有时是间接的，例如通过对接收国情况的描述和交流、通过移民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对比、通过侨资企业或学校在母国进行的宣传活动等。有时是直接的，如移民直接回国或通过海外投票的方式参与母国政治选举等。某种程度而言，国际移民正在成为融合官方与非官方层面的社会参与的重要媒介。移民进行“社会性汇款”的影响涉及范围颇广，例如移民可以对母国国内的劳工的权益保障的诉求进行声援和帮助，可以通过个人交流的方式影响国内亲人和社群的社会行为，可以为处在冲突和动荡中的母国带来的舆论导向或为冲突某方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甚至通过“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影响母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公民身份认同。^③这些影响有可能对母国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导致母国的局势更加复杂和恶化。

（二）来自母国的赋权——对移民的“英雄化”与“他者化”

移民在接收国经历“再社会化”后，通过“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对母国进行影响，本质上是接收国为移民提供了新的不同于母国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而移民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这些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从而能够在与母国的互动过程中对母国产生影响。但是，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并非仅依靠单方赋权就可以实现，还需要母国的赋权从而保证影响渠道的畅通性。实行不同移民政策的母国对国际移民进行赋权的程度是不同的，承认双（多）重国籍的国家一般会比不承认的国家赋权程度更深，也会留有更多的渠道吸纳来自海外移民的影响。但是，即使不承认双（多）重国籍的国家，也有大量公民以永久居留的方式生活在海外，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母国的社会产生影响。所以，母国移民政策的松紧程度固然对移民发挥政治影响起到了一定的赋权作用，但其更主要的赋权方式依然是基于国际移民的“双重联系”性而出现的。本文认为，来自母国的对移民的赋权，是通过对移民进行“英雄化”或“他者化”而实现的，这两种方式在客观上为移民提供了对母国产生影响的权力和渠道。

对于一些移民母国而言，如果海外移民在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那么这些移民母国倾向于通过将国际移民进行“英雄化”的方式实现对其的赋权。早期对“英雄化（heroization）”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与传媒学中，近年来该术语也被用于分析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对特定人群的“英雄化”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意义上建构过程的产物。^④“英雄”的意义在于“战胜”，表现为作为超越式的个体，带领群体突破局限，从而为群体带来希望。^⑤所以英雄的本质在于对非英雄群体的影响力和引领力，“英雄化”的过程，本

① Russell King, and Julie Vullnetari. "Orphan Pensioners and Migrating Grandparents: The Impact of Mass Migration on Older People in Rural Albania". *Ageing & Society*, 2006, 26 (5): 783 - 816.

② Douglas Massey,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19 (3): 431 - 466.

③ Khatharya Um. "Diasporic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Refuge: Canada's Journal on Refugees*, 2006, 23 (2): 8 - 19.

④ Matthew Stanley, et al. "Heroization and Ironic Funneling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3, 125 (1): 29.

⑤ 薛静：《从“英雄”到“英雄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国产动画电影》，载《艺术广角》，2019（6）。

质上就成为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或者个体的赋权过程,非英雄群体赋予了英雄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权力。这种影响既可以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如对非英雄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如对非英雄群体的政治倾向和投票行为的影响。^① 所以,“英雄化”可以被视为一个特定对象在所处群体中成为焦点的被赋权的过程。^②

基于此,“英雄化”的概念同样可以用于分析海外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许多移民母国都出现了对移民进行“英雄化”的行为,如对移民群体进行媒体宣传和公开表彰等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菲律宾对其海外劳工的“英雄化”行为。菲律宾的劳务输出正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新社会”建设政策背景下,菲律宾于1974年出台《菲律宾劳动法》,将劳务输出作为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此后历任总统几乎都延续了重视海外劳务输出的国家政策。198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将菲律宾劳工称为“新英雄”,此后菲律宾政府与社会便沿用了这种说法。菲律宾海外劳工被政府塑造为菲律宾的当代“新英雄”,被视为为了家庭与国家的发展而牺牲自己、勇于与海外的恶劣环境与思乡之苦斗争的英雄。从1989年起,菲律宾开始设立年度“新英雄”奖项,旨在表彰菲律宾海外劳工“在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和推广菲律宾人作为有能力、负责任和有尊严的劳工的形象,以及为其社区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方面所做的重大努力”^③。每年的6月7日被定为海外劳工日,菲律宾海外劳工回国会受到英雄般的迎接,除了在机场有专门铺设红毯的通道之外,还可以获得总统的亲自接见。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被写入《菲律宾共和国第7157法案》(Republic Act No. 7157,也被称为“1991年菲律宾对外服务法”),该法案将海外菲律宾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并列为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④

通过将海外移民进行“英雄化”,移民母国强调移民对于祖国社会发展的“利他”属性,加强了海外移民的自豪感以及对母国的归属感。这在增加汇款流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移民群体影响母国的渠道和权力。某种程度而言,这种赋权行为是基于移民与母国互动的正向反馈而得出的,移民通过在海外的劳动赚取侨汇推动母国经济社会发展,母国则通过对移民进行“英雄化”的行为为移民赋予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但是,移民与母国的互动也并不总是正向的和相互促进的,还存在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移民影响母国政治进行赋权的行为,本文概括为母国对移民进行的“他者化”行为。在上述分析中,移民都是作为母国“自我”的一部分进行互动的,即虽然移民并不生活在母国,但基于其“双重联系”的特点,移民仍然被视作母国的一部分。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母国也可以通过对其海外移民进行“他者化”,客观上为这些海外移民提供影响母国社会的渠道。萨伊德将“他者化”视为西方与东方之间二元对立的过程,即西方为了强化其优越性和控制力而构建东方形象为负面的、不同的、异域的、低劣的和落后的过程。^⑤ 该过程后来也被用来分析当代的种族问题、性别歧视等相关社会问题。在移民领域,“他者化”的视角常见于接收国对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他

① Tobias Schlechtriemen. “The Hero as an Effect: Boundary Work in Processes of Heroization”. *helden. heroes. héros*, 2019, (5): 17-26.

② Ralf Hoff, et al. “Heroes-Heroizations-Heroisms: Transformations and Conjunctur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 *helden. heroes. héros*, 2019 (5): 79-95.

③ 参见菲律宾 Bagong Bayani 基金会网站: <http://www.philembassymadrid.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Forms/BBFI%20Brochure.pdf>

④ 原文为: 1. Pre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2. Promotion and attainment of economic security; 3.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promotion of the welfare and interest of Filipinos overseas. 参见: <http://philembassybrasil.org/index.php/about-the-philippines/philippine-foreign-policy>.

⑤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Books, 2003, pp. 1-28.

者构建上。

相比于移民接收国，对于移民母国而言，对移出的本国移民进行“他者化”的构建更为困难。这些移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于母国来说很难被界定为“他者”，因为天生共同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以及移民遗留在母国的大量社会资本，都导致他们很难被排除在母国的“我们”之外。即使二代三代之后，共同的血缘和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都使得这些移民的后代依然难以完全被母国“他者化”，更不必说在移民后代中时常出现的逆同化（anti-assimilation）趋势。^①所以母国对移民进行“他者化”的构建，必须另寻他法，并相应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较弱的社会性。

对于移民母国而言，通过“他者化”的方式为移民进行赋权的行为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特定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移民个体进行的他者的塑造，另一种则是有意识地对移民进行的武器化的利用。第一种母国对移民的“他者化”构建行为往往针对流亡海外的敌对政治势力，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指责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费特胡拉·居伦组建“平行国家”密谋削弱前者的政府，长期针对其在土耳其境内外的追随者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并且将“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母国对移民的“他者化”构建往往伴随着将特定移民构建为对母国政府的颠覆性威胁，并体现出针对个体移民而非群体移民以及政治程度较高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定的移民个体处于“双重联系”的跨国空间之中，使得母国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当这些移民在离开母国之前就在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情况下，很容易激发母国政府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他们被母国政府“他者化”，从母国的角度主动切断与该移民的联系，从而打破移民的“双重联系”的特点。然而，这个“他者化”的过程反而赋予了这些海外移民进一步影响母国的权力和渠道。除此之外，由于意识到移民“他者化”后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部分移民母国出现了另一种通过“他者化”对移民进行的赋权行为，即母国主动对移民进行有计划的“武器化”。这个过程涉及的移民被称为“战略策划的移民”（strategic engineered migration），指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有意诱导或操控的向内或向外的移民，其目的是增加、减少或改变居住在特定领土内的人口构成，以达到政治或军事目的。^②在这个过程中，母国将移民进行分类和物化，将其中特定的移民作为武器而进行利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80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报复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而发动的马列尔偷渡事件。在该事件中，古巴为反制美国而放开对马列尔港的管制，使古巴国内大量存在社会问题的人口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对迈阿密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不良影响，迫使美国政府修改相关法律，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正如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所说：移民在当今战争中的角色愈发重要，新战争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难民比例上升，而且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口不仅仅是冲突的后果，还可以被看作是各种参与冲突的行为者采取的战略方式。^③这种做法体现了部分移民母国有意利用移民的“双重联系性”，通过向接收国输出移民的方式，试图影响接收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从而为母国增加赢得冲突或战争的筹码。

综上，与传统移民研究把移民行为视为“单程旅行”的视角不同，跨国主义视域下移民的跨国实践创造出的是一个跨国的社会空间。由于这个空间既连接着移民的接收国又连接着移民的母国，故呈现出跨国联系的特点。这就使得移民呈现出“双重联系”的状态，在这个空间中，移民体现出一种在融入接收国的同时依然保持与母国持续不断地联系的趋势。正是这种“双重联系性”客观上

① Mauricio Espinoza. "Nine. The Alien Is Here to Stay: Otherness, Anti-Assimil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Latino/a Superhero Comics". In Frederick Aldama, and Christopher González. *Graphic Borders: Latino Comic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pp. 181 - 202.

② Kelly Greenhill. "Strategic Engineered Migration as a Weapon of War". *Civil Wars*, 2008, 10 (1): 6 - 21.

③ Mary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s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John Wiley & Sons, 2013, p. 213.

赋予了移民影响母国政治的可能性和权力。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流动创造出了跨国空间，构成了跨国联系，其重要性与复杂性日益引起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重视，也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方向。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Home Countries of the Migrants

LI Xiaf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the bias of emphasizing on the countries hosting immigrants, especiall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the host countries, while neglecting the long-term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nd their h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migrants on their home countrie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for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continues to ris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on the poli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y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creates a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The trans-territorial nature of this space enables immigrants to possibly influence their home country politically. Such possibility and power are achieved through “dual-empowerment.” On the one hand, after being re-socialized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immigrants seek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through “social remittances”. On the other hand, in heroizing migrants as the other, the home countries of the migrants also pave the way to facilitating the migran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Key words: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ual-connection; Dual-empowerment

(责任编辑 杜心蕾 责任校对 杜心蕾 林 间)